



# 无罪的程序治理

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

谢进杰 等 著

# 无罪的程序治理

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

谢进杰 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罪的程序治理：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 /  
谢进杰等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495-7969-3

I. ①无… II. ①谢… III. ①无罪推定—研究—  
中国 IV. ①D925.01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915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541100 )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23 字数：368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4.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认真对待无罪命题的人们

### 撰稿者及分工：

谢进杰：撰写代序、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结语、后记并负责全书命题、构思、修订、统稿

高 通：撰写第四章、第七章

朱桐辉：撰写第五章

罗晓珊、魏湘粤：撰写第六章

成 安：撰写第八章

## 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代序)

### 一、小事例与大命题

2015年初发生于Z大学的教授职称评审的一件小事例影射了学术评价的某种非学术化现象:同行评审专家写出了“从静态上看”送审的专著“进行了深入研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多次获奖并入选‘中青年法学文库’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从动态上看”因为专著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修订出版的,且其中小部分观点曾作为前期阶段性论文发表于《法学研究》,因此不具有原创性,且学术成果质量、学术影响力、学术水平均达到差评等级的“同行专家学术评价意见”。“意见”通篇没有一句话是在评价学术观点,未就评审成果论及的学术问题本身作半句评论,且对送审三项代表性学术成果中的另外两项只字未提,就以“从静态上看”虽然“进行了深入研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但“从动态上看”因为是“基于作者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专著”所以“不具有原创性”的逻辑和根据,形成了“权威”的“同行专家学术评价”。尽管前面“教授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两个评审环节基于该“意见”并非“学术”评价等考虑而不受其影响均予全票通过,但最后的“大评委”评审环节全部评委均不属于法学专业领域,且“意见”内容不上会、只在表格上反映出有一位同行专家给出了否定评价的“数据”。实质上,“因为专著是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所以没有原创性”的“学术逻辑”与“权威评价”不但最终得到认同,甚至还被隐约引申出“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专著如果较早出版用于评讲师、副教授就有原创性,但如果等到用于评教授才出版就不具备原创性了”的“评审逻辑”。

这只是一个小事例,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普遍性,但却是观察眼下学术生态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小事例本身也许只不过是一次“意外”,但小事例背后所隐含的,却是值得揭示的“大命题”——我们置身于什么样的学术生态,我们欲迈向什么样的学术国度?而要讨论这样的“大命题”,就必须认真对待、重新反思如下两个貌似已经过时实则有不少“学者”那里尚未解答的

“小问题”：学术，缘何而来，为何而往？学者，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作为？

## 二、心术、权术与学术异化

学术异化，无疑已成为当下学术的微观领域亟须警惕的现象，甚至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严重影响学术生态的一种倾向乃至风气。盘点眼下学术圈的学术异化现象，无论学术创作领域，还是学术发表领域，抑或学术评价领域，均可一定程度地举出种种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估且以“Q教授”指称那些并不鲜见的在学术活动中心术不正、玩弄权术、异化学术的“学者”。

譬如，在学术创作领域，“Q教授”为了增加成果数量，而拼凑劣质论文，炮制垃圾著作，编辑毫无独创性的教材，丝毫不去考虑学术质量，甚至采取引而不注、变相抄袭、隐性剽窃等学术不端行径；“Q教授”为了使论文看上去“严谨”“有创新”或合乎自己的假设，而篡改数据，捏造论据甚至进行大幅度学术造假。而在学术发表领域，“Q教授”为了追求科研发表量，采取自我复制、排列组合、重复发表等做法，甚至采取翻译改装、侵占成果等手段；“Q教授”为了使成果得以发表，采用拉关系、打招呼、走人情甚至挪用行政权力干预编辑审稿、利用权力资源形成学术交易的方式。

然而，表现尤烈者，则是在学术评价领域。例如，在学术评审中，“Q教授”采取“谁上对我有利，谁上对我不利”“谁打了招呼，谁没打招呼”“谁跟我走得近，谁跟我走得远”的“利己标准”乃至“打压异己政策”，甚至拉着同行评委拜托其一同将自己同事“对手”打下去，将学术评奖、课题评选、职称评审等异化为以地位、权势、关系、派系、面子、私利、政绩乃至学术竞争形势、权力博弈格局为考量标准的潜规则勾当，使本应以被评审对象学术质量高低为核心评判标准的学术评审异化为按照评委话语权高低、利益关系与评委会权力结构、派系格局分割学术资源蛋糕的活动。又如，在论文答辩中，“Q教授”对采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论文投了否定票，理由是“那不是一篇法学论文”；“Q教授”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论文明示或暗示答辩委员会成员必须评为“优秀”，即便是对于一篇糟糕的论文，甚至利用论文答辩不惜牺牲学生权益打压学术竞争对手。再如，在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评判中，往往以发表多少论文、出版多少专著、主持多少课题、获某级领导批示、获某级奖励、担任某行政职

务、兼任某政府职位的“标准”模式来评判“Q教授”。<sup>[1]</sup>

如此种种,在学术领域,“Q教授”们摆弄的是心术、权术,玩弄的是学术,就是不按学术逻辑、不用学术标准,做的却是学术或关乎学术的事情;在“Q教授”的信念与行径中,学术只不过是手段,学界就是江湖,学术异化状况可见一斑——“Q教授现象”的实质,就是学术异化。学术异化与学术制度以及学术的整体风气息息相关,学术制度及其营造起来的学术生态和形成的学术风气决定了学术异化现象的滋长空间;学术异化又更多地存在和表现于学术的微观场域,体现为“Q教授”们的具体而实在的异化的“学术”活动,被“Q教授”们当作一种活生生的“学术”生活方式,实质也与心术、权术紧密相连——“Q教授”们将非学术的心术、权术应用到了学术的领域、学术的“志业”。

### 三、学术,为了什么

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发问:学术,为了什么?学者为学术的初心是什么?有人投身于学术,是源自好奇心,是为了探寻未知、求解不知,揭示问题、发现真理、探明规律,其乐无穷;有人潜心于学术,是酷爱学术的生活方式,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理性言论,津津有味;有人沉醉于学术,是享受学术的过程与果实,读书治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孜孜不倦。有人立志从事学术,是为观念革新、社会改造,批判现实、针砭时弊、励精图治,天下为公;有人辛勤耕耘学术,是为理论建树、知识传播,提出命题、定义概念、建构观点,理想满满;有人热爱坚持学术,是为坚守最初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心中的梦想,与更多的人分享驾驭世界的猜想、造福未来的想象与美好社会的构图。一言以概之,为了真、善、美、为了真理与正义,一切的学术努力,都是如此的无可厚非,令人膜拜敬仰。然而,有的人跻身学术圈,是源于深深的功利心,是为了以学术谋官、谋利、谋富贵,对学术没有信仰,对真理没有敬畏,不明白学术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学术只不过被当作一种勾当;也有的人本着单纯的初衷走进了学术,后来却不知不觉将学术仅仅当成手段,尤其是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偏移了学术

[1] 关于学术异化现象的更多描述和分析,可参见刘东《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杨守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明《学术评价制度批判》,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李海萍《大学学术权力现状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忠海《学术异化的机制及其合理性思索》,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年;江新华《学术何以失范——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彭江《中国大学学术研究制度变革》,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的标准与轨迹,在成名成家以后变本加厉地将学术演变为聚敛权力与资源的方式。

学术异化现象的显著表征就是在学术的领域却不从学术出发、不按学术标准、不走学术逻辑,不以学术论英雄,学术追求不单纯,学术评判不纯粹,学术沦为摆弄心术、玩弄权术的工具。学术异化源于人性的弱点,与“Q教授”的心术、权术及其对待学术的立场、态度、方法、境界息息相关,也与学术的制度、风气、秩序紧密相连。但一位心地善良、品质纯朴的学者,即便学术能力、眼光、方法、视野、境界有限,如果其心无旁骛地怀有对待学术的虔诚,别说有多大的学术担当和怎样的学术魄力,只要其留有对待学术最基本的底线精神,就不会太过于偏离学术的轨道,做出那些有损其真学者形象的“学术勾当”。时下的学术圈,不乏有独立学术见解甚至已经作出不小学术贡献但却学术信仰泯灭、学术胸襟狭隘、学术伦理沦丧的“Q教授”。说到底,在“Q教授”们的内心深处,其在乎的并不是学术整体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而是自身占领着怎么样的学术资源、地位、权力、名誉和利益,支撑其混迹于学术领域的,是私欲而不是信念,是私利而不是真理,尤其当其面对心中拟设的学术竞争“对手”作出有创见、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时,不是为了整体认知、思想和理论的进步而欢悦,而是感到心里不舒服甚至对其制造障碍、挑起麻烦、伺机打压。在“Q教授”们的心里、眼里和手里,学术就是江湖,学术不过是手段,其赖以驾驭学术的是心术、权术,而不是心无旁骛的学术理念。

#### 四、拿什么来评价学术

我们该拿什么来评价学术?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是言称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出版过多少本专著、主持了多少项课题、获得了多少项奖励,还是实实在在地探索了什么命题、提出了什么创见、发现了什么规律、形成了什么思想、推进了什么理论、推动了什么变革?衡量学术成就的高低,是以发表什么“CI”论文、出版什么“国家级”专著、编写什么“统编”教材、主持什么“国家级”课题、取得什么“领导”批示、获得什么“省部级”奖励,还是以推动了人们的认识、革新了人们的观念、推进了制度的正义、改造了社会的实践、加速了理论的进步、改善了生活的世界?不争的事实是,时下学术圈介绍一位学者的流行话语模式就是发表多少论文、出版多少专著、主持多少课题、获得多少奖励;甚至存在如此一种普遍的怪现象,就是一位学者著作等身却拿不出一篇代表作,涉猎领

域广泛却未曾对某一命题有所理论贡献。2015年被称为“三无科学家”的屠呦呦因发现了青蒿素,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获得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学者,拷问了含括中国院士制度在内的学术评价机制。眼下国内的学术评价,普遍采取以发表论文刊物级别、出版专著单位级别、主持课题来源机构级别、获得奖励颁发机构级别、获得批示领导级别、担任学术行政职位级别等为主导的标准与模式,并且往往限定了“以本单位署名”“最近几年内”等准入条件和“不少于多少项”等数量要求。这俨然是一种以学术外标准衡量学术质量、以非学术因素干预学术规律的评价机制,是以外行评价内行、行政影响学术、数量衡量质量,学术甘当权力附庸、行政奴隶、政绩工具和急功近利、封闭短浅、浮躁庸俗的评价模式,绝不是一种“十年磨一剑”“一本书主义”的激励经典的学术评价机制。

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应当坚守学术信仰、尊重学术规律、秉承学术自觉,应当深入学术本身,以学术的标准、尺度、精神和话语,看重学术成果对于推动认知、思想、观念、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并且应当是一种科学的、专业的、开放的、反思的、站得高看得远的、经得起检验的、纯粹的学术评价。在理想状态下,同行专家学术评价是一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模式,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得当,不愧为扭转依赖外在标准评价学术的格局而深入学术内寻求科学评价的机制,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同行专家所作出的评价是一种符合学术规律、合乎学术公正的评价。从根本上,同行专家评价机制有赖于一种学术的制度、学术的生态和学术的心志,即在一个健康良性的学术国度,基于健全的学术制度和公认的学术伦理,同行专家本着对真理的虔诚,恪守学术的立场,尊重学术的规律,秉着对学术的认知,形成纯粹学术的评判。而当有任何学术外的因素试图干预或者可能影响其学术判断时,同行专家就可以拒绝,也应当回避进行学术评价;但如果同行专家偏离学术立场、违背学术道德作出非纯粹学术的评价时,则应将受到学术同行的鄙视,被纳入不信任的专家黑名单,丧失学术信誉,甚至可能导致其从此无颜立足于学术界参与学术对话。同行专家的学术评价应当受到高度重视,恪守学术良知、达致学术境界的评价观点应当得到像对待真理般的尊重;但又不简单作为判断和决策的唯一依据,关键是看其是否科学公正、经得起检验,或至少把关其是否属于学术的评价。任何一份同行专家评价意见本身都应当被晒到学术的阳光底下经得起更多同行的学术评价,然而时下国内采取的同行专家评价诸多是对评价伦理无法把关、对评价方法不予检验、对评价意见不加甄别,放任以同行专家评价之形行学术打压之

实、“一棍子打死”，任凭不中立、不对称、非理性的异化的学术评价现象滋生蔓延。

真正学术的评价机制，在学术制度不健全、学术风气不纯粹的体制格局与生态环境下，也许只能是时间，但绝对不是某“CI”、某“级”、某“长”、某“士”或者某非学术的“同行专家学术评价结论”。屠呦呦 2015 年获得诺贝尔奖，距离 1972 年发现青蒿素已是 43 年<sup>[1]</sup>；而约翰·格登早在 1962 年就发表论文报告发现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sup>[2]</sup>，至其 2012 年因此项学术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整整等待了 50 年。而事实上，诸多获诺贝尔奖的大师，如果按照国内当下普遍的学术评价标准，在其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放到国内许多大学可能连评职称都成问题，原因可能是没有发表“CI”论文、没有主持“国家级”项目，甚至是因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并非近年内”或“未署本单位”“成果数量不够”，乃至“因为是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所以没有原创性”。然而，一项真正经典的学术成果，从形成、发表（甚至未能发表）到获得检验、认可，可能需要多年甚至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譬如科斯在 1937 年以其本科论文为基础发表了《企业的性质》阐明产权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sup>[3]</sup>，开始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沉默数十年，直至 1991 年才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经典。那么，究竟，学术，我们该如何评价？！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也许唯有时间，一项学术成果只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住岁月的沉淀，方能成就真正的学术经典。

## 五、什么样的学者品格，什么样的学术境界

诸如“Q 教授”的“学者”形象，大致可用庸俗、势利、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心术不正来形容，实为“伪学者”。诚然，这些品行也是人性的构成部分，而“Q 教授”也是人，自然不能“脱俗”。但问题不在于人性的优与劣、善与恶、好与坏，而在于你是“学者”，学者就应当有学者的品格，学者就应当表现出学者异于常人克服人性弱点的精神和品行，即“学术品格”。问题也在于，在学术的

[1] 屠呦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Tu Youyou, "The Discovery of Tu Youyou's Artemisinin -- The Gif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Nature Medicine* 17, (2011): 1217—1220。

[2] J. B. Gurdon, "The Developmental Capacity of Nuclei Taken from Intestinal Epithelium Cells of Feeding Tadpoles," *J Embryol Exp Morphol*, vol. 10, no. 4 (Dec., 1962): 622—640.

[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 (Nov., 1937): 386—405.

领域,做着学术的事情,却采取了非学术的标准,利用了非学术的方法,作出了非学术的评价;那么,学术的境界呢?!

当一个国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学者丧失了学者品格、学者情怀和学者的担当、学术的境界,是一件可悲且极其可怕的事情。“学”者“觉也,悟所不知也”<sup>[1]</sup>,系指求学、做学问、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sup>[2]</sup>,其知识、技能、创造力、思想境界往往超越普通人,能够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形成判断甚至发现新领域、革新观念、引领潮流。严复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sup>[3]</sup>学也好、术也好,知也好、行也好,学者首先应当是“以学术为业”。但“以学术为业”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源自心灵的热爱,没有心无旁骛的执着,没有甘于孤寂的专注,何以做到“以学术为业”?! 马克斯·韦伯就告诫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sup>[4]</sup>

在“以学术为业”的起点上,学者应当秉承学者的品格与情怀:譬如独立、脱俗,如果学者热衷于对权力的附势趋炎,甘以学术充当政治奴隶和政绩工具,那么就将难逃学术行政化、学术庸俗化的厄运;譬如真善、开放,如果学者没有高山景行的品质,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没有求真求善的精神,就注定难

[1] 班固:《白虎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52页。

[2] 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947页。

[3] 严复:《〈原富〉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5页。

[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

逃学术狭隘主义、学术短期化甚至学术威权主义的倾向；譬如专注、执着，如果学者不能专注于学术、执着于真理，而是将时间、精力散布于应付种种事务、应酬、公关，甚至热衷于各种“招安”、攀附和炫耀，将很难想象能够产出沉淀得下来的经典作品；譬如好奇、纯粹，如果学者不能始终持有一颗年轻的心，保持着对于挖掘命题、探索未知、发现真理、阐明规律的好奇与冲动，不能保有一颗对于学术的纯粹的心灵，而是掺杂着形形色色的物质的、权力的、眼前的动机，那么也不容易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譬如严谨、反思，如果学者轻易满足于对固有理论或流行观点的搬运和堆砌，或者在对待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充当“老好人”“万金油”“万花筒”，而没有严谨的学术立场、敏锐的问题意识、独特的学术眼光，没有善于批判反思、勇于开拓创新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魄力，也不易达致真正的学术创新；譬如谦卑、中立，如果学者取得一点学术成绩就沾沾自喜、桀骜自恃，甚至以唯我正确的傲慢态度拒绝倾听、学习和反思乃至丧失客观中立，就有辱学者之名与学术之责，也必定无以攀登学术高峰；譬如公义、担当，如果学者没有公义心，没有学术的担当，不忠于真理，不捍卫正义，就不容易在学术判断上秉持公正立场作出公正评判，也难以想象能够作出有益于认识世界、发现规律、革新观念、改造世界的学术成就。

学者的品格影响着学术的境界，什么样的学者品格，对应什么样的学术境界。学者的品性应当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捍卫正义，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sup>[1]</sup>，“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sup>[2]</sup>。学者一旦丧失学者的自我和学术的人格，失去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学术的自由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和庸俗思维，学术终将沦为政治的奴隶与权力的附庸，坠入学术庸俗化的困局。学术既不应为外在物所绑架，也不应为私利所驾驭，当如梁启超将“无所为而为”“为学问而学问”定义为“学问之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sup>[3]</sup>，默顿将“无私利性”视作“科学的精神特质”与“学术的制度要

[1]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61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清华大学王观塘先生纪念碑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3]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十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求”<sup>[1]</sup>,费希特将“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定位为“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sup>[2]</sup>。学者如果没有对真理与正义的执着,没有真正的学术理想和信仰,不能达致心无旁骛的学术心灵境界,而是眼里、手里、心里装满着利益、权力、地位、资源、政绩之类的,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位“Q教授”。学术领域应是学术场、真理场、正义场而不是权力场、资本场、名利场,当学者们普遍认为“学术领域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必太过当真”时,是一件可怕且可悲的事情,而当“Q教授现象”横行时,则学术界势必沦丧学术的境界。

## 六、什么学术初心, 什么学术国度

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学者都是怀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对待学术的初心步入学术的殿堂的。不管在通往学术的道路上是如何地披荆斩棘、如何地举步维艰,无论是像艾萨克·牛顿般幸运的“只是一个在河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了一个贝壳”<sup>[3]</sup>,还是像马克斯·韦伯所告诫的“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sup>[4]</sup>,心无旁骛的学术初心始终都不能变。学者的学术初心一旦变了,可能就永远无缘于那种“惊心动魄的一跃”和“捡到了一个贝壳”带来的学术体验,无缘于领略学术的境界,甚至在不知不觉的学术庸俗化过程中偏离了学术的轨道、扭曲了学者的形象。

学术,本质就是一件苦力活,但是在秉持学术初心的学者那里,却是一种乐在其中、其乐无穷的心灵体验。马克斯·韦伯说,“灵魂不经过寂寞和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对于学术的虔诚当如柏拉图《理想国》所勾勒的那段“奇妙的体验”：“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身后是他们无法看到的光源。他们只注视着光线透在岩石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回身看到了太阳。他在目眩中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所见。别人都说他疯了。但是他逐渐适应了注视光明,此后他的任务便是爬

[1]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9页。

[2]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0页。

[3] [美]詹姆斯·格雷克:《牛顿传》,樊相静、吴铮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序言。

[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回岩洞的囚徒那儿,率领他们回到光明之中。这是一位哲人,太阳则代表着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才不理睬幻觉和影子,努力达到真正的存在。”<sup>[1]</sup>王国维先生点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三重境界。<sup>[2]</sup>学者应当具备一种心无旁骛的学术秉性,应当秉承对于“头上的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康德式的敬畏与信仰<sup>[3]</sup>。即便是在学术的制度、风气和秩序不甚良善、健全的现实状态下,真正的学者也应当具备管他如何学术评价,甚至管他是否学术发表,只管心无旁骛地学术创作的魄力和境界,具备爱因斯坦式的“简单”:“我所追求的东西非常简单,我要以我微弱的力量,冒着不讨任何人喜欢的危险,服务于真理和正义”<sup>[4]</sup>,因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sup>[5]</sup>。

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就是要唤醒学者心灵的学术理想主义。学者心中如果没有怀着一种纯粹而炙热的学术理想主义,学者如果没有认识世界、改造社会、革新观念、追求真理、发现规律、发展理论的好奇、信念和抱负,学者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家国情怀、世界主义和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始终有着持续而深切的关怀,将很难想象学术的有所作为。“心无旁骛的学术”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和体验必要的孤独,学术的本质就是一场孤独之旅,甚至就像费希特所描述的“把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愉快休息当作工作、事情,当作自己生活里唯一的日常劳动来做”<sup>[6]</sup>。“心无旁骛的学术”还意味着恪守学术的纯粹,追求学术的至真至善至美,坚守“为学术而学术”<sup>[7]</sup>、“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sup>[8]</sup>,学者对待学术当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凡学者之态度,皆

[1] [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31页。

[2]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3]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4]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最后讲稿》,《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韩文博、何维国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5]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2页。

[6]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页。

[7] [德]马克思·韦伯:《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1—102页。

[8]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95.

当为学问而治学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1],当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当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2],当如爱因斯坦所坚信的“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3]。真学者,就应当有一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4]的学术气概,有一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5]的学术魄力。

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就是要营造良善理性的学术制度主义。鉴于学术创作、学术发表和学术评价构成的学术链中任何一环的非学术化都足以影响整体学术生态,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必须要构筑心无旁骛的学术链,让无论是学术创作抑或是学术发表与学术评价都回归于学术,恪守学术立场,遵循学术规律,采用学术标准,捍卫学术荣誉,以营造心无旁骛的学术生态。从悲观主义情调出发,当下欲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如果不兴起一场关于学术评价的革命,可能不容易从根本上改变奴性化、庸俗化、短期化的学术生态。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必须是开放的、自觉的、反思的学术国度,而不应是布满学术威权、学术压制、学术造假甚至学术腐败和学术氛围紧张、学术道德沦丧、学术风格单一、学术成就浮夸的学术生态,学术的制度建构应当为营造良善理性的学术生态而有所作为。学术制度的建构应当具有站得高看得远的学术制度主义眼光,而不应追求短期政绩与局部利益,尤其应当给予将学术视为志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以足够的宽容、耐心和激励。爱因斯坦警醒说:“真正的创意只存在于年轻时。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功名的影响,人会在不知不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93页。

[2] 蔡元培:《读周春嶽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0页。

[3]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页。

[4]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毛泽东诗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6页。

[5]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毛泽东诗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觉中变得愚蠢。”<sup>[1]</sup>而眼下整体的学术评判机制实质并不容许至少并不呵护年轻学者潜心做学问,既有的学术制度几乎不给“十年磨一剑”与“一本书主义”留下多少鼓励空间,譬如科研立项要求两三年内就结项、职称评审只看近三五年内成果且重数量远过于重质量,更可怕的是采取外在标准及外行机制进行学术评价,而对于那些勇于冲破社会意识禁锢与思维惯性蒙蔽、挑战所谓权威理论与主流观点的青年学术研究并不能给予开放、宽松、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些学者既不能倾听不同声音、尊重不同观点也不能乐于见年轻学术的崛起与兴盛。当然,计较学术评价,实质又并不是一种心无旁骛的学术心态,而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尤为核心和关键的还在于坚守心无旁骛的学术创作,甚至从根本上讲,学术的本色应当是从不接受任何源自权力的考核——虽然说任何人都有权评价学术,但真正有权检验学术的,乃是真理、是时间、是世界运转的规律——诚如爱因斯坦所强调的“真理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sup>[2]</sup>。

迈向心无旁骛的学术国度,并非呼吁学术无为,而是要达致学术有所为有所不为。学术理想主义与学术的实用主义、学术研究的实证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等是并不矛盾的,学术如果不能造福人类、改善世界,学术的意义也必将黯然失色;而学术制度主义也并不是要为学术赋权、贴金和确保学术的物化利益、外部风光,而是要致力于营造一种心无旁骛的学术的制度秩序与学术生态。刚刚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勾勒了“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的“总体方案”,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力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强调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甚至提出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sup>[3]</sup>显然,只有有好的学术,才有好的大学,才有好的高等教育,学术强国与教育强国相辅相成,只有学术强、教育强,才有经久不衰的综合国力,而世界一流大学和—

[1] 参见[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箴言》,张文青编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2] [美]爱因斯坦:《科学定律和伦理定律》,《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刘明编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3] 参见国务院2015年10月24日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